

宁波文化研究工程·专门史研究

宁波经济史

NING BO JING JI SHI

乐承耀 著



NLIC29707537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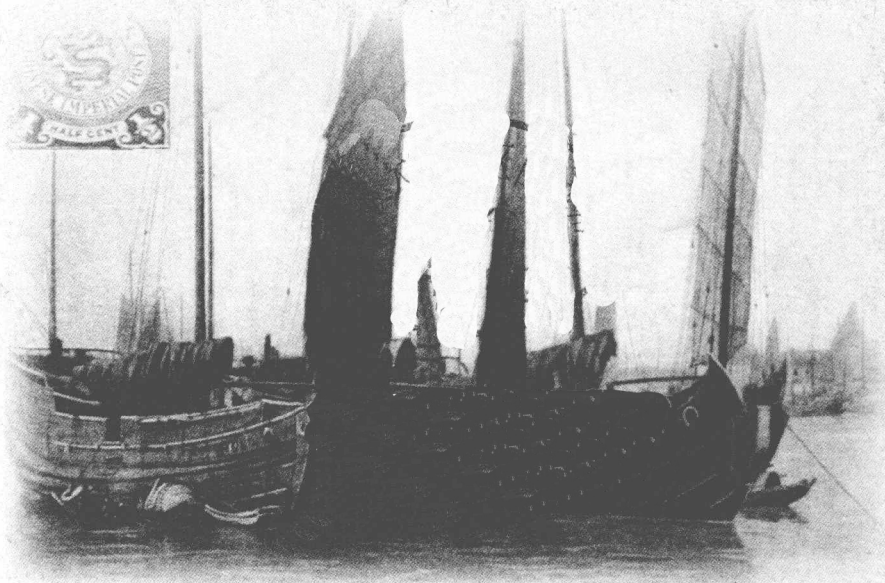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宁波文化研究工程·专门史研究

宁波经济史

NING BO JING JI SHI

乐承耀 著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宁波经济史 / 乐承耀著. — 宁波: 宁波出版社,
2010. 11

ISBN 978-7-80743-658-4

I. ①宁… II. ①乐… III. ①经济史—宁波市
IV. ①F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18733 号

宁波经济史

作 者 乐承耀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宁波市苍水街 79 号 315000)

责任编辑 何小平 沈建国

印 刷 浙江开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1.25

字 数 320 千

版次印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43-658-4

定 价 45.00 元

导 论

宁波经历了以封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经历过长期的复杂曲折的发展过程。

早在七千年前的河姆渡人时期,已存在史前的原始经济。到商周时期从原始经济向传统经济过渡。秦汉以后,传统经济得到开发,但与北方相比,还相对落后,即使与同属会稽郡的山(阴)、会(稽)相比也处于边缘地区。直至唐中期,宁波经济才得到开发。唐宋以后,宁波逐步成为我国著名的工商业城市和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开埠后,成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社会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笔者认为,宁波自原始时期至近代,经济大体经历四个发展阶段:①先秦至唐中期:原始经济与传统经济的缓慢发展;②唐中期至宋元:传统经济得到开发,港口城市的确立与兴盛;③明至清代前中期:传统经济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出现;④晚清:传统经济向近代经济转变,农业、工业商业领域出现资本主义因素。

自古至晚清,宁波的经济总体上处于持续发展状态,但各个阶段实现这种发展的途径、形式及表现是有所不同的。这由当时的生产方式的变化所决定和制约。下面就四个经济发展阶段的状况作一简单介绍:

一、先秦至唐中期:原始经济与传统经济的缓慢发展

宁波地处东海之滨,全国大陆海岸线中段,姚江、奉化江和甬江汇集于三江口,构成独特的地理优势和区位优势。丰硕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证明,早在距今六七千年的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已经在宁波生活。

河姆渡遗址、慈城小东门遗址、余姚鲞山遗址、田螺山遗址、奉化名山后遗址和象山塔山遗址的发掘,为研究当时的原始经济提供了依据。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表明宁波先民以自己的智慧创造了令人惊叹的文明。其中数量

巨大而又保存完好的栽培稻遗存,说明稻谷是当时人们种植的主要农作物,先民在当时已懂得水稻栽培技术。精巧的干栏式建筑、原始的纺织工具及日用制陶技术的掌握,足以证明原始手工业的出现。

夏、商、周三代宁波为越之地。商周时期,鄞和句章相继兴起。这既是鄞、句章先民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的结果,同时促进了鄞、句章经济的发展。鄞州区的已出土的66件春秋战国的青铜器中,生产工具为44件,占60%。青铜器用于垦荒、耕种、栽培水稻。当时,鄞、句章的经济从原始农业向传统农业过渡,主要表现是从石制、骨制工具发展至青铜工具,农作物产品增多,使农业生产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与此同时,手工业得到发展,主要是制陶业、造船业和纺织业。造船业的发展,有利于民间水上交通,也使句章成为全国五大贸易港口之一。但应该看到,鄞、句章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同属越国的山阴、会稽相比,是较为逊色的。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宁绍平原上的山阴、诸暨、鄞、句章也被纳入了大一统的秦王朝的版图。大约自西汉中叶开始,时属会稽的鄞、鄮、句章和余姚,由于人口逐渐增多,经济开始出现缓慢复苏,稻作农业出现了粗放式的“火耕水耨”的耕作方式。到了东汉,宁波的定居农业进一步发展。杜湖、白湖、上林湖、烛溪湖等湖的兴修及句章陂池的修筑就是例证。牛耕和铁制工具的使用,使宁波的农业生产得到了较快发展。而青瓷器的成功烧制和商业活动的逐步兴起,对于宁波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占有不同,社会因此而改变了过去“无千金之家”的状况。

宁波与绍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同属于会稽郡,直至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明州(宁波)、越州(绍兴)分设。秦汉以来,鄞、鄮、句章、余姚时属会稽(越州)。其中鄞、鄮、句章三县是该区域的边缘地区,与山阴、会稽相比,人口相对稀少,经济发展落后。六朝依然这样,《宋书·刘子尚传》记载说:“时东土大旱,鄞县多田,世祖使子尚上表至鄞县劝农。”^①大明四年(460年)会稽太守孔灵符上表奏请朝廷移山阴(今属浙江绍兴)贫困的农民到余姚、鄞、鄮3个县开垦“湖田”,朝廷为此引起争论,最后孝武帝同意“从其徙民,并成良业”^②。这就表明,六朝宁波不仅行政上一度隶属于会稽(越州),而且经济发展缓慢,仍然处于荒芜的边缘地区。

① (梁)沈约《宋书》卷八〇《刘子尚传》。

② (梁)沈约《宋书》卷五四《孔季恭附灵符传》。

尽管如此,宁波经济还在发展。在晋人陆云《答车茂安书》的记述中,可以看到当时的鄞县一带自然资源丰富,农业实行刀耕火种,修筑陂湖进行灌溉。尤其是鄞县的钱湖(东钱湖)、罨脰湖(广德湖)已成为重要水利工程,灌溉大片土地。鄞、句章、余姚也修筑了方胜堰、烛溪湖等小型水利。农业产业结构、生产技术和手工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也有提高。六朝宁波纺织、制砖等手工业有所发展。东汉出现的新兴制瓷工业,在六朝更有发展。青瓷窑址分布广,鄞、鄞、句章、余姚普遍设有窑址,达 19 处之多。商业、交通运输业也初步形成。吴、东晋的士族势力得到快速发展,成为统治者执政的基础。

现有研究表明,唐中期以前,明州(宁波)一带由于人口较少,经济发展速度依然不快,仍旧处在低度开发的状态,但应该看到隋至唐代前期,宁波经济在前代基础上有一定发展,人口增多,经济也有一定发展。贞观年间小江湖修筑和造船业的建造,都是例证。只是到唐代中叶以后,宁波经济才得到大规模开发,至宋元时期而达于繁盛。

二、唐中期至宋元:港口城市的确立与兴盛

宁波的开发始于唐中叶至宋元时期,其标志是明(州)越(州)分治与港口城市形成,其时间为 738 年(开元二十六年)至 1368 年(至正二十八年),长达 600 年之久。

随着人口的增多,在相对安定的唐中期至元代的 6 个世纪中,宁波经济进入开发阶段。开元二十六年(738 年),宁波单独设立了明州,而明州、越州分治是宁波跨入正式开发阶段的标志。

明州建立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州治设在相对偏僻的小溪,大历六年(771 年),鄞县县治由小溪移到了三江口,这意味着句章港东迁三江口这一历史进程基本完成,其作用是使甬江流域经济开发从低山丘陵向平原地带推进,港口所蕴涵的巨大的区位优势逐步得到显现。长庆元年(821 年),明州州治移到了三江口,州城成为明州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标志着新兴的港口型城市的正式确立。

随着人口的继续增多和唐代政府发展生产的政策,宁波的传统农业有了发展,其显著的标志是水利建设大规模的开展。据不完全统计,唐代宁波开凿和兴修的水利工程达到 30 项,其整治规模、灌溉面积都远超前代。其中主干工程为东钱湖、广德湖和它山堰,灌溉土地面积达数十万亩。此外还修筑

了塘、堰、碶、闸水利工程。唐中期至五代,明州大大小小的水利工程,已经改变了唐以前的以陂湖为主体的点状式分布格局,从而促使区域的农业改变,初步形成以发展粮食为主,兼顾桑麻、茶叶、药材生产的农业结构,使得农业经济结构更趋于多元化。

中唐至五代,明州的制盐、酿酒、造船、纺织、冶炼等手工业也都有发展,最突出的表现是制瓷业的异军突起。仅据1985年复查,上林湖就发现窑址190多处,其中唐代中期遗址达56处。越窑青瓷名闻国内外,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越窑窑场遍布明州,且所制瓷器质量属上乘。陆羽认为北方的邢瓷不如越瓷:“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①

商业发展水平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伴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明州的商贸活动逐步兴盛。区域商贸活动活跃。州城的东渡门至姚江边的渔浦门一带则有集市贸易出现。慈城有街市、商贾,宁海城关“商贾贸迁,店肆逐兴”^②,余姚集市兴旺,有“越州巨镇”^③之称。优良港口是明州商贸最大和最宝贵的优势资源。明州的发展与港口的兴衰息息相关。杭甬运河全线开通,激活了内河运输,使得明州的腹地大大拓展,促进了海上贸易。在唐代之前的宁波海外联系处于自发的状态,唐中期至五代,明州港的开发呈现出新的格局,尤其是南北路线的开拓,为中日之间的贸易提供了有利条件。当时的主要贸易国家是日本、高丽。从开成三年(838年)起,民间商船来往于明州与日本之间,十分频繁。商人张支信、李邻德、李延孝等数十人在两地之间来往不绝。

北宋中期以后,尤其是南宋,北方移民大批定居,致使人力资源、田地资源、水利资源、手工业资源和海外贸资源都优于北方地区,明州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在两浙路的经济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明州农业生产的发展,突出表现在水利工程兴修与水利网络格局的基本形成。明州的水利事业,经过仁宗、神宗、宁宗、理宗四个时期的集中治理,东钱湖、广德湖、它山堰等水利工程整治远远超过前代,碶、堰、闸、埭普遍兴修,海塘堤岸围筑,形成了以湖泊—河网—海塘为特色的水利网络格局。这一

① (唐)陆羽《茶经》卷中《碗》。

② 《宁海城关镇志》第8篇《商业》,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③ 《余姚镇志》第1章《建置》第2节《古县城》,1989年版。

网络格局导致“三北”(慈溪、余姚、定海三县北部)平原的沿海防潮体系的形成。鄞县东部东钱湖灌溉水系和西部它山堰灌溉水系及南部奉化江、白杜、横溪为中心的灌溉水系的完善,较好地解决了明州的水利问题,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为区域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两宋,明州为缓解人口增加而造成的压力,竞相开垦土地,出现了与山、海、湖争地的局面,明州人民开创了涂田、圩田、淤田等垦田方式。仅定海(镇海)县在政和六年(1116年)人均垦田就达9.37亩,^①超过两浙路的人均垦田数,从而扩大了耕地面积,缓解了人地矛盾,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当然,湖田以填塞湖塘水泊为代价,过度围湖,也会影响水利设施功能的发挥并会破坏水源。为此,在南宋,明州地方政府采取一些积极措施,多次下禁令限制民间滥行侵垦的侵湖行为。

明州的农业生产结构是以粮食作物种植为主,水稻、麦、粟、黍等是主要粮食作物,同时,因地制宜,利用不同的地理条件,广泛种植桑、麻、茶、席草、水果等经济作物。由于精耕细作,推广良种,明州地区水稻的单位面积产量大大提高。北宋末,广德湖周围的民田每亩产量达到六七石,为全国水稻亩产的最高纪录。^②

农业经济的发展,人口消费总量的扩大和海外贸易的发展,刺激着明州手工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内部分工的细化,表现为手工业门类的日趋齐全,多种多样,如纺织、造船、酿酒、煮盐、制瓷、刻书等多种行业并存;不少手工业生产部门在经营规模和制作工艺水平在前代基础上有所提高,在两浙甚至全国享有盛名。造船业是明州最发达的手工业,造船技术处于国内外领先地位,造船载重吨位已居全国前列。煮盐业发达,不但产盐量高,而且所产之盐质量属上乘。

明州地区的商业在两宋进一步发展,突出表现为专业分工的扩大、市镇经济迅速兴起、城区商贸的繁荣。

① 戴栩《定海七乡图记》(《浣川集》卷五)载,政和六年(1116),计有16226户,垦田为3300顷,平均每户为21亩。如按张传玺《中国历代户口、田亩统计表》(《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48页)统计,大观四年(1110年)每户本均口数为2.24推算,定海县的人均垦田约为9.37亩。

② 漆侠的《宋代经济史》认为,宋代粮食亩产一般为二三石,最高是五六石。按漆侠先生推算,一石折今市石6.6斗,合92.4斤,则亩产为4600斤至544斤。明州广德湖亩产为六七石,合549斤至646斤,故为宋代粮食亩产最高水平。

从资源视角审视,自然资源是经济发展的物质源泉,也是产业分工扩大的前提。由于地域差异,因此有不同的产业分工。随着明州农产品的商品化和城乡之间、城镇之间的商品交换日趋频繁,作为商品交换中心的市镇迅速发展。北宋多数草市位于城市周边或地处交通要道。北宋舒亶就有“草市朝朝合”的诗句,并作“四郭皆有市”^①注释,表明明州在北宋已有草市。南宋的庆元府(明州)已形成29个市镇,表明南宋中后期该地区的基层商业网络已初步形成。

州城商贸的繁荣,是明州(庆元)商业发展的重要表现。首先,“行”、“团”等行业组织大量出现,如花行、竹行、米行、鲞团、波斯团等。各种与商业活动有关的服务性行业兴起。其次,交引铺出现。交引铺经管交引买卖、货币交易,重视作保活动,并经营布帛等生意。南宋主要集中在都城临安(今杭州)和明州(庆元)等地,庆元府在城区及城郊设有西门、南门、沈店、宋诏桥、望春桥、江东等6个引铺。再次,商税额增加。州城商贸繁荣最为直接的体现是在商税征收额增加上。熙宁十年(1077年),明州商税额总数为27837贯,其中州城税额为20220贯,约占总税额72.6%。到南宋中期,州城税额仍占总税额的53.5%。由此反映出州城区域商业经济中心的地位已形成。

明州造船和航海技术的进步以及地方政府对海外贸易的日趋重视,表明明州(庆元)港在两宋的海外贸易进入了一个新的繁荣期。国内埠际贸易频繁,海外贸易管理机构市舶司的设立,加强了对明州(庆元)海外贸易的管理。而且与东亚的高丽、日本的贸易空前兴盛,因南海航线的拓展,明州与东南亚、波斯湾沿岸各国的贸易大为加强。南宋张津的乾道《四明图经》卷一《分野》中说:“南则闽广,东则倭人,北则高句丽,商舶往来,物货丰衍。”这正说明明州的海外贸易之盛居于浙江首位,与广州、泉州齐名。

元军在占领庆元的过程中,社会经济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但并不严重。由于元初统治者采取发展经济的一些措施和庆元人民的艰辛创业,元代宁波依然保持经济上的区域中心地位。

元初执政者实行“汉法”,采取“劝课农桑”等一系列发展农业的措施,促进了庆元农业的恢复和发展,耕地面积扩大,农业生产结构日趋合理。突出表现为两点。一是棉的种植面积扩大。稻、麦、粟粮食作物外,继续扩大蚕桑、茶叶、麻、药材、果品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棉花在南宋已有种植,但大面

^① (宋)舒亶《和马粹老四明杂诗聊记里俗耳十首》,乾道《四明图经》卷八。

积推广则是元代的事情。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元政府在庆元置“木棉提举司”,对庆元植棉加以管理。二是水利建设取得成就。海塘修筑谱写新篇章。至元四年(1338年),余姚州判官叶恒历时4年,对上林至兰凤的浙东海塘进行大规模修筑。其后,又多次修筑,以石加固,形成了长2422.5丈的坚固石堤。

庆元的手工业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根据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劳动者身份不同,庆元手工业分为官府手工业和民间手工业两种。纺织业和兵器制造业为官办手工业,由庆元染织局和杂造局主管。元政府实行盐专卖政策,庆元为重要产盐地区。庆元盐运分司管理浙东盐的生产和销售,下辖10个盐场,占两浙盐运司所辖的34个盐场的29.4%。盐的产量高,仅至正年间(1341—1365年),盐产量就为119606引,折合23921.2吨,大大超过前代。官学刻书兴盛。延祐六年(1319年),奉化知州马称德的活字印刷,是一种新型的印刷术,又推动了庆元的刻书业。民间手工业以个体为多,也有雇工经营,主要集中在棉纺织业、造纸业、编织业、酿酒业等。

在庆元的经济结构中,海外贸易占有重要地位。在前代基础上,庆元海外贸易进一步发展。至元十四年(1277年),元政府在庆元设市舶司,大德二年(1298年)后,浙江诸港贸易归庆元市舶司管理。与庆元有贸易关系的有东南亚、西亚及非洲的国家和地区,但主要是日本、高丽。木宫泰彦指出:“日元之间的贸易港,在元朝是庆元,在日本是博多。因此,所有的商船往来于这两港之间。”^①庆元进口的货物多达225种,要比南宋宝庆《四明志》所载的170余种多了50多种。这就表明,庆元不仅成为元代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而且是很重要的埠际贸易港口。

三、明至清前中期:传统经济继续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出现

这一时期上起1368年,止于1840年鸦片战争前。宁波社会经济得到了重大发展。农业、手工业、商业等领域出现明显的变化,大大超过前代。

明代的重农政策在宁波得到较好地贯彻。招抚流民,开垦荒田,普遍兴修水利设施。天顺年间(1457—1466年)宁波各县修筑河湖、潭、堰、塘等小型工程达178处,嘉靖年间(1522—1566年)达214处,仅百年时间就多了36处。

^① [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01页。

农业生产技术提高,着重在选种、播种、耕耘、灌溉、施肥、治虫等生产环节下工夫,并从外地引进番薯、玉米。农业生产结构依然以植稻为主,兼顾经济作物种植。

手工业在元代基础上有新的进步。明中叶以后,随着工匠人身依附的减弱,商品经济的活跃,民间手工业有了长足进步。嘉靖、万历以后,民间手工业逐渐占据主导,纺织、造纸、刻印、造船、制盐、酿酒各业继续发展。

由于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宁波的商品经济发展很快,商业活动出现了活跃的局面,主要是集市的崛起,商贩活跃,商业资本的积累与海外贸易发展。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是市舶司。明代前期主要是朝贡贸易,据《敬止录》记载,日本朝贡货物分9大类248种。这是从永乐志交流货物清单中所了解的。元代货物未分国家为225种,仅日本朝贡贸易货物品种就超过元代23种,可见宁波海外贸易兴盛。明中叶后,宁波走私贸易兴盛。

清代前中期,宁波的农业亦有长足的发展。面对明末清初的浙东战乱和农民大量逃亡、耕地严重荒废的破残景象,地方政府实施垦田政策,清丈土地,扩大耕地面积,招徕流民,缓征和豁免田赋。宁波地方官吏还把兴修水利看作是发展农业、富国利民的要政,重视水利的整治和修筑;同时,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在种植水稻、麦类等传统作物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改良品种,提高栽培技术,合理施肥,整治耕地。

清朝前中期,宁波的手工业快速发展,主要表现为官营手工业的逐步衰落和民间手工业的发展。一些行业向民间开放,如盐业、酿酒业及造纸等行业,被民营手工业取代,以商品化生产为特征的手工业向广大农村延伸。民间手工业在棉纺织业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出现了一批与农业分离、专事棉织的手工业者。

随着全国政局的稳定,社会生产的迅速发展,宁波商业兴盛起来。乾隆年间(1736—1795年),商业繁荣。据雍正《宁波府志》记载,当时宁波城区以鼓楼为中心,形成东直街、西直街、开明街三条商街。清中叶以后,宁波出现江夏、灵桥门、药行街等商业区。

宁波是港口城市,自古以来海外贸易兴盛。到了清代前中期,宁波港口和海外贸易的发展受到影响,但民间贸易依然存在,一度相当活跃。管理宁波对外贸易的是浙海关,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在宁波设立,监管船只、货物,征收关税。乾隆年间(1736—1795年),浙海关仅处理国内贸易和中国

商人出海事宜。由于闭关政策的影响,宁波港口发展和海外贸易发展曲折。清初,宁波商人冲破清政府的“海禁”,与日本等国进行贸易,一时比较兴盛。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廷允许广州一地贸易,宁波港停止对西方商船的“稽征”,但国内埠际贸易有所扩大。嘉庆、道光年间(1796—1850年),宁波港与国内沿海诸港贸易有很大发展,与此同时,宁波商人日趋活跃,北至关东、天津,南至闽广,中到苏、湘、鄂,入川渝。仅在镇海、上海驻港商船就达400艘。商人组织纷纷建立。仅乾嘉年间,就在北京、上海、汉口、吴江、常熟及浙江杭州、嘉兴、湖州、兰溪等地组建20余个四明公所与四明会馆。

这一时期,宁波经济发展的最大特点是经济作物商品化与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宁波府简要志》卷三《商贩》就有记载:“苧麻,产鄞县西山下,笋干,出鄞县天童山,柏油、竹纸出奉化,商贩苏(州)、杭(州)等处货卖。”乾隆时,余姚北方沿海140余里皆植木棉,“每至秋收,贾集如云,东通闽粤,西达吴楚,其息岁百万计,邑民资是以为生者十之六七”^①。在这种情形下的农家生产和生活,与市场发生密切的联系。作为市场化、商品化的直接体现,自明中期起,宁波府所属各县及余姚、宁海迅速崛起一批市镇,集市越来越多,开市日期增加,出现专业集市、综合集市、转运集市等不同类型的集市。宁波各种层次、各种类型的集市兼备,既有所侧重,又互相补充,构成宁波区域市场群体。现有研究表明,明中叶后,宁波集市的功能和作用十分明显,它满足了当地民众生活和生产的需求,把相对孤立的分散的集市联系起来,沟通宁波与全国及海外市场的商品流动,从而推动浙东乃至全省、全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宁波港的发展和宁波帮的形成。

钱庄、典当铺与银行都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由于商品经济发达,清代前中期,宁波的钱庄和典当铺在市区及各县普遍开设,成为这一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另一特征。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宁波的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主要体现在“合股”现象的出现和雇佣工人的出现。明万历年间,宁波商人在经营中逐渐积累资本。定海(镇海)商人严翠梧、方子定等合股经营,雇佣把舵、水手出海贸易。清代雍正年间,余姚雇佣专业染工。余起贤在龚维能染店做工,每月工资800元。余起贤完全与生产资料脱离,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当然,这一时期

^① (民国)杨积芳总纂民国《余姚六仓志》卷一七《物产》。

的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是缓慢的。

四、晚清：传统经济向近代经济转变

这一阶段始于宁波开埠到 1911 年辛亥宁波光复,是由封建经济向近代经济转变的阶段。这一时期,宁波的社会经济发展出现了新情况、新特点。

传统农业衰落,出现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农业。完成了从传统农业向近代农业的转变。主要表现为三点:

一是农业生产的商品化程度明显提高。经济作物种植面积进一步扩大和商品化的提高,农民以植桑、茶、棉、蔬菜等经济作物为主。比如,光绪初,从余姚、慈溪至上虞沿海百余里农民多以“植木棉为业”。宁波种植的棉花、茶叶、药材成为重要的出口商品。

二是农业生产中的资本主义因素进一步发展。晚清宁波农村自然经济解体和农产品商品化的同时,农业生产中出现资本主义因素,其表现为使用机器生产与农牧垦殖公司的出现。资料表明,宁波农业生产应用近代机械农具和用机器进行农产品加工。比如,通久源机器轧花厂与和丰纱厂用机器轧花和纺纱。鄞县绅商创办钱湖实业及慈溪的树艺畜牧公司等。

三是创办农学会,设立农学堂,传播西方先进农业生产知识。同时,创办农事试验场。

在晚清,宁波的手工业有新的变化。主要是官府手工业的衰落,传统手工业变化,手工工场增多,并采用新式机器生产,家庭手工业者成为手工工场或工厂外的手工工人。传统手工业向近代工业转变。

清代前中期,纺织等手工业被政府严格控制,到晚清,民营手工业快速发展。官府生产的纺织品主要满足皇室、官僚等消费需要,而民间手工业生产纺织品主要作为商品在市场上交易。比如,鄞县小溪妇女咸事蚕织,“出售于市”^①。许多纺织品出口。光绪元年(1875 年),宁波每年出口绸缎 270 担,到 1891 年(光绪十七年)增加到 362.35 担。仅 6 年时间出口绸缎就增加 92.35 担。手工工场采用新式机器,这是晚清手工业的主要特征。当时,宁波的手工作坊普遍,不少使用机器进行加工生产。

资本主义家庭劳动的形成又是这一时期手工业的重要特征。宁波的一

^① (清)光绪《鄞县志》卷七四《土风》。

些家庭手工业者成为手工工场或者一些工场、作坊外的手工工人,计件劳动,领取酬金。火柴业、草帽业、机器制造业的零活等,不需要集体协作或使用机器生产,可以采用家庭劳动的形式来承担。鄞县西乡栎社、石碶、黄古林的草席编织就是例证。民国《鄞县通志》说:“草帽业之兴迄今凡三十余年,妇女几人编织为生者不下十万口,行商数十家,贩户三千余人,运销外洋值千余万之。”^①

宁波开埠后,由于“洋货”的输入和“土货”的不断输出,宁波城乡商贸业发生新的变化,形成了区域商业中心。主要表现为城区商业的发达,以鼓楼为中心,形成较为完整的商业网络。东大路、西大路、药行街、江夏街、半边街、后塘街,交易兴旺,特别是江北岸的商业十分繁荣。集市贸易继续发展,普遍出现双日市和单日市,集市贸易格局发生急剧变化,贸易网络从地方性发展到区域性、全国性。

商业近代化倾向明显。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考察。

第一,形成以外贸为主,内贸、外贸结合的格局。开埠前,宁波有海外贸易,但规模小,甬商贸易区域以日本、高丽为主,运输工具比较落后,一般使用帆船。晚清,宁波海外贸易空前发达,不仅与沿海、沿江的城市埠际贸易,而且对外贸易迅速扩大,海外贸易工具由帆船转为轮船,通商区域由日本、高丽扩大到东南亚、欧洲、美洲、大洋洲。由于自然经济的抵抗,开埠初对外贸易遭遇挫折。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宁波海外贸易的发展,对宁波的商品市场及港口近代化产生深远影响,促进了宁波近代化的进程。

第二,商业经营方式和手段发生变化。一是经营内容发生变化。清代前中期,宁波经营农副产品与手工业产品。开埠后,从单纯的农副产品交易中渐渐以经营机器产品为主,出现了不少洋广货的商品。江北商业区和江夏商业区,各种香水、羊绒、钟表、丝巾和西洋糕店比比皆是,机制产品在销售中占有绝对比重。二是资本筹集方式变化。宁波传统商业多为独资、合资。但清末,宁波城区一些商业实体采用股份公司的组织形式。三是经营方式变化。商业企业的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实施新式财会制度。经营手段有经销、代销、代购、包销多种。注重商品包装和陈列、广泛利用报刊等途径进行广告

^① (民国)《鄞县通志·食货志》丙编《工业》,宁波出版社2006年版。

宣传。

第三,新行业的出现。从浙海关贸易报告看,宁波进口品种不断增多,从而形成新的行业,诸如钟表眼镜、西药、西装、洋广杂货、五金等。比如,清末的四明大药房、中日大药房就出售西药,久丰洋广纱庄、源康洋布店经营洋布、羊绒等。

企业的产生和发展,是晚清宁波经济史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宁波开埠后,外商经营的企业已经开始产生和发展,美华书馆是外商在宁波开办的第一家企业。同治、光绪(1862—1908年)以来,上海的“旗昌”、“逊昌”、“宝隆”等洋行到宁波拓展经营业务。与此同时,宁波开始出现洋务派创办的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但其规模较小。通久源机器轧花厂、慈溪火柴厂和民营航运业为代表的宁波近代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也在晚清产生。通久源轧花厂的创办揭开了浙江近代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序幕。清末,宁波民族资本主义企业达37家。宁波民族资本企业的产生和发展是一种进步,是近代生产力的代表,对于宁波乃至浙江近代经济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当然,宁波近代民族资本企业发展缓慢,行业集中在纺织、航运,经营规模小,投资少。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不少宁波籍的实业家在家乡创办实业,同时,在上海、北京、天津、汉口、苏州、杭州等口岸城市经营新式企业。尤其在上海,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不仅在商贸、航运业独占鳌头,而且金融资本雄厚,执上海商会之牛耳。

目 录

导 论 / 1

第一章 先秦至秦汉时期宁波的经济

第一节 史前时期的原始经济 / 1

一、耜耕稻作农业 / 1

二、从渔猎、采集到人工饲养 / 3

三、原始手工业的出现 / 4

第二节 商周时期宁波的经济 / 6

一、从原始农业向传统农业过渡 / 6

二、手工业的开发和制瓷业的光起 / 8

三、水上交通发展与商贸业的出现 / 11

第三节 秦汉时期宁波的经济 / 12

一、人口增多与传统农业的发展 / 12

二、手工业的进步和陶瓷的制造 / 16

三、商品经济的发展 / 18

四、贵族与农民、奴婢的经济地位 / 20

第二章 六朝时期宁波的经济

第一节 农业与渔业 / 23

一、劝课农桑与耕地垦辟 / 23

二、兴修水利设施 / 24

- 三、农业生产结构 / 26
- 四、农业生产技术 / 27
- 五、捕捞活动的出现 / 29
- 第二节 手工业的开发 / 29
 - 一、青瓷业的发展及其成就 / 30
 - 二、纺织业与编织业 / 32
 - 三、其他手工业 / 33
- 第三节 商业的逐步兴起 / 34
 - 一、商业的进步 / 34
 - 二、商业交通发展 / 36
- 第四节 阶级结构与阶级关系 / 37
 - 一、虞氏的豪族统治 / 38
 - 二、各阶级地位 / 39
 - 三、社会矛盾激化与民众反抗 / 42

第三章 隋唐五代时期宁波的经济

- 第一节 农业的显著进步 / 44
 - 一、水利工程普遍兴修 / 44
 - 二、土地的开发与利用 / 47
 - 三、农业技术的进步 / 50
- 第二节 手工业的发展 / 51
 - 一、纺织业 / 51
 - 二、制瓷业名闻中外 / 53
 - 三、盐业与酿酒 / 55
 - 四、造船业的进步 / 58
 - 五、采矿冶金业 / 59
- 第三节 商业日渐发达 / 60
 - 一、明州城的建设 / 60
 - 二、区域商贸活动活跃 / 63